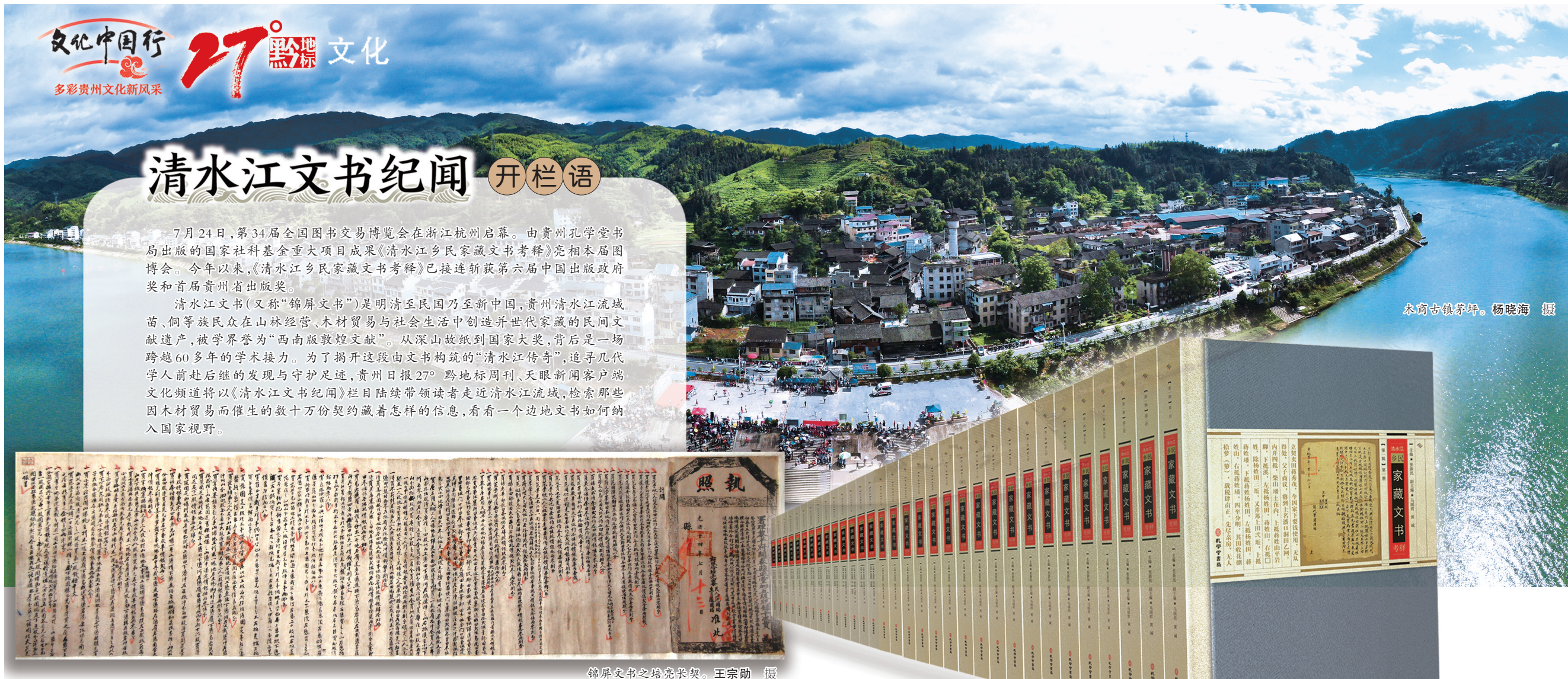




杉木顺流而下 商贾溯江入黔

——清水江文书应运而生

本报记者 曹雯 实习生 陈宣伊 刘世玲

1 皇木：进入明王朝视野

7月的清水江，山风习习。

站在黔东南州锦屏县平略镇平整村的高处望去，一泓碧波托至山腰，将这个高山苗寨映衬得苍苍壮壮。村东头有一处山坳，当地人称它“皇木坳”。相传古时此处生长着一株4人才能合抱的巨杉，被选作皇木进贡朝廷，“皇木坳”由此得名。

地名的由来已难考证。但清水江的木材确实进过紫禁城——明清宫殿里的梁柱，有不少是从贵州清水江“漂”过去的。

7月17日，记者在锦屏县档案馆原馆长（锦屏县史志办公室原主任）王宗勋。他长期从事地方志编纂和清水江文书、碑刻的征集整理研究工作。刚开口问及“木材贸易如何带动皇木的发现”，王宗勋便纠正道：“不对，不对，是先有皇木采办，才有木材贸易。”

王宗勋介绍，最早进入清水江流域的外地木商，主要为安徽、江西、陕西3地。他们财力雄厚，成群结队而来，有的本身就与皇木采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商人来到清水江下游的天柱、锦屏一带，通过本地人向林区深处收购木材。”

锦屏县三江镇下辖的茅坪、王寨、卦治3个寨子，因地处清水江流域林区东缘，自然成为木商们的落脚点。但这里有一个天然的障碍：语言。下游来的汉族木商不会讲苗语、侗语，上游林区的苗侗民众不会讲汉语、不会写汉字，双方交易无法直接进行。3个寨子因较早与汉族人打交道，那些既懂少数民族语言、又懂汉语、会写汉字的村民便显现出优势。木商来了，借住在他们家里，由他们带入山区向林农采购；离开时，木商会主动支付些银两作为酬谢。随着木商越来越多，村民干脆开起了“歇店”，提供食宿、翻译、联系材源、寻找买家等一条龙服务。

清雍正年间，清朝于清水江上上游新设清江、台拱、丹江、八寨、古州、都江6个厅，这片既往政令罕至的苗疆腹地，自此纳入常态化国家行政管辖。贵州巡抚张广泗在王寨设总木市，稍征“江费”。这一举措，把此前民间自发形成的木材交易中心，变成了官方认可的市场体系。开设木行、主持木材贸易，在当时被称为“当江”。

2002年3月，由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及牛津大学学者组成的考察团，在锦屏县清水江沿岸村寨进行田野调查。他们乘着窄长的机动船，在水流湍急的清水江上逆流而行，两岸的青山密林、舟边的江水游鱼，让他们感觉走进了历史现场。时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的刘志伟回忆：“在航程中我们走下了一个河滩，发现一块大石上刻着嘉庆二年由徽州、江西和陕西商人同‘主家’协同订立的江规，规定以此为‘山贩’湾泊木材和下河‘买客’停排之界。由山贩、买客和当地主家关系构筑的社会背景，顿时浮现在我们面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锦屏附近清水江放排场景。单洪根 摄

源源不断的木材从清水江顺流而下，带来的是大量白银。清代《黎平府志》记载：“黎部产木极多……唯杉木则遍行两湖、两广及三江等省。远客来此购买，每岁可卖二三百万金。”

这里的金，实则是银两。如此巨额的白银流向了哪里？王宗勋的解释是，一部分变成了山林田产，“木材贸易让山场土地不断增值，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一部分变成了教育和功名，王宗勋说：“当地富商纷纷聘请先生教育子弟。瑶光的姜志远靠经营皇木发家，两个儿子考中文举，一门两举人，轰动一时。河口姚百万家更是出了3个武举。”

更多的白银，流进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食盐、布匹、农具沿水路源源不断地运进苗乡侗寨，集市在码头边兴起，木行、屠宰、洗染、豆腐、打铁等作坊和酒肆以及杂货店林立，在清水江畔的村寨间形成了一派街景繁荣、市声喧腾景象。

其中最惹眼的，当属清水江木运带来的滚滚银钱熔铸成苗家女子流光熠熠的头冠饰物，将江河之上的商贸繁华，点缀在了的一方乡土女子的肩头。

在黔东南的苗乡侗寨，每逢节日，妇女们从头到脚缀满银饰。王宗勋说，“那时候，男人们在外工作，这么多白银放在家里不安全。江西、湖南一带的手艺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背着工具走村串寨帮妇女把家里存的银子打成银饰，把家产穿戴在身上。”清代徐家干所著《苗疆闻见录》里写道：“喜饰银器……其项圈之重，或竟多至百两。炫富争妍，自成风气。”

事实上，明清两代的大量白银来自海外。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写道：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100年间，全球总计约38000吨白银中，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流到了中国。这当中的有些白银或许沿长江水系逆流而上，进入清水江流域，被苗侗妇女锻打成银饰，佩戴于身，变成了深山中的银光。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所言，贵州民族文化的真正特质并非被动的封闭保存，而是主动的适应性创新。“他们在最适合自己的文化生态下不断创造本土特色，努力汇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潮中。”

3 繁华：货店林立缀银争妍

4 记录：保存海量契约文书

顺着清水江奔流而来的木材贸易，伴随日益复杂产权关系，催生了契约文书的大量使用——这便是今天学者研究清水江文书的由来。

2002年与中山大学学者一同前往锦屏考察的牛津大学学者科大卫，评价清水江文书为“世界上罕见的大量系统反映民族与社会历史状况的契约文献”。在那次考察中，令学者难忘的是，在寨子里普通村民家中随便拉开一个抽屉，就能看到数十份清代的契纸。

山场归谁、林木股份如何分配、租佃如何分成、木材如何买卖——这些都需要契约来保障和确认，促使原本不识字的苗侗民众开始学习汉字、书写契约。最开始乡民们写的字很丑，后来越写越好。从文书书写水平的变化，可以看到汉文化不断融入清水江流域的轨迹。

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看来，清水江文书“不像官方史书那样宏大叙事”，而是记录了“一棵树如何被买卖、一块山场如何被分割、一个家庭如何解决纠纷”的琐碎细节。捧着这一份份原始契据，宛如走进乡民的生活现场。

随着汉字的普及和书写的日常化，清水江文书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山林买卖的范围。土地租佃、遗产分家、民间借贷、纠纷调解、乡规民约……凡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过的，几乎都能在文书中找到对应的记录。张新民认为，正是这种“草根性”，让它成为研究西南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鲜活见证。

2010年，锦屏文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今年3月下旬，由张新民担任首席专家主编、孔学堂书局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第一辑、第二辑）荣获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这套书规划三辑44册，系统整理了黔东南清水江沿岸天柱县的7500余份乡民家藏文书。学者希望，以文书为纽带，从西南认知中国，从中国观察世界。

站在平整村的高处眺望，清水江碧波万里。这条发源于贵州南部、流经黔东南腹地的河流，曾让一江杉木顺流而下，木市商贾溯江入黔，催生海量交易契约——清水江文书正是这条水道商贸繁华留下的记录，也见证了贵州乡土与全国物资流通、人群往来、文化交融的紧密联结。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提供坚实鲜活的史料支撑

学者看清水江文书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主编张新民：

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是继甲骨文、汉晋木简、帛书、敦煌文书、徽州文书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文献成果，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被统称为三大文书系统。因诞生于多民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清水江文书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突出，《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从底层史料展开乡民日常生活的全息图景，还原具体的历史情境，为完整认知中国补充了“西南视角”。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

清水江文书的价值，最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活态的文献”，是从历史延续至今、仍带有生活温度的文化存在。清水江文书提供了一条从小地方透视大历史的研究路径，几十万件契约文书记录的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拼凑出中国基层社会几百年来如何自我组织、如何运行、如何变迁的真实图景，意义远超出贵州一个区域的范围，会成为理解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重要“钥匙”。

厦门大学教授郑振满：

清水江文书是不可复制的原始记录，具有唯一性、实践性、现场性，真实反映基层社会运行，是研究区域历史与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民间文书具有天然碎片化的特点，而张新民团队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坚持田野调查，立足文书原生环境；二是严守系统性，保留一户一档原始结构，可追溯流转路径；三是深度考释，多维解读、严谨扎实。这为民间文献整理提供重要示范，具有重要学术与社会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国林：

清水江文书庞大的文献体量是核心竞争力之一，目前清水江文书已核实的数量约50万份，民间仍有大量未被发掘的文书，其体量远超以往各类民间文献，为区域史、民族史研究提供极为丰富的资料保障。更重要的是，这份文献的价值具有全国性意义，清水江文书的系统研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坚实、鲜活的史料支撑。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吴才茂：

《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标志着清水江文书整理工作完成了从文献刊布到价值激活的关键跨越。以往清水江文书整理多以原件影印为主，字迹潦草难以辨识，乡俗俚语晦涩难解，而《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实现了从影印到考释的范式突破，为研究者扫清文书中的释读障碍，尤其是在乡俗俚语、方言术语等疑难之处提供可靠依据。

本报记者 向莉君 整理

融媒产品 请扫码观看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赵怡 版式设计：侯刚